

THE LOCAL IDENTITY OF TIAN SI'S MAHUA ECOLOGICAL LITERARY

本土化的马华生态文学——以田思为研究个案

孙彦莊, 孙彦彬

Dr Seng Yan Chuan, Seng Yan Ping
(马来亚大学, University Malaya)

The early stage, Mahua literature was influenced by China in terms of values and concepts. In addition, the western literature thought and the translation of literature also make Mahua literature influenced by western literature culture. With the transformation of the times, Mahua literature has gradually been transformed by Malaysian cultural traditions. The poems of Tian Si can be considered as the pioneer of ecological poems and the works show his concern about the crisis in natural and in mental ecology under the powerful influence of commercialism in Sarawak. This paper emphasizes on the local identity of a series of ecological environment on his works from different styles of expression, a more comprehensive picture of deforestation, species crisis, soil erosion, miscellaneous pollution, smoke and haze disaster, mangroves atrophy, apes and threaten the survival of marine life, insects ravaged ecological crisis and environmental problems. The nature writing poems express their ecological aesthetic appeal for the respect of life and, ecological ideal of returning to nature, in hopes of arousing people's aspiration for a harmonious nature.

【Key words】 Tian Si, local identity, nature writing, ecology, harmony

摘要:

早期的马华文学在价值观及理念方面受中国影响; 随着时代的转变, 马华文学逐渐被马来西亚的文化传统所改造。东马在世界第三大岛婆罗洲北部, 其于地理环境、民俗文化、原住民、动植物生态等各方面都是有待开发的文学资源, 给在地书写者提供了重要的生态写作场域。本文兹以田思作书写婆罗洲砂拉越生态的作品进行探索与诠释, 分析他的生态文学在传统与现代、民间与主流、西方与本土的特质中, 如何展现出崭新的面貌。其中包括这位作家从关怀世界到本地的生态问题, 也探讨他如何借助大马现实、环境及生活的浑融, 令作品中的雨林场景呈现出马来西亚另类的精彩风貌。此外, 也探讨刻画雨林的创伤所运用的地方语言形式笔调。作品巧宽了文学的审美疆界, 也给传统的马华生态文学带来了新型的艺术特色及价值。

【关键词】 马华生态文学，田思，本土化

早期的马华作家是从中国南来的移民，而马华文学就在中国新文学的催生下萌芽与发展起来。开始时，作品含有浓重的侨民意识，逐渐有移植现象，随着“南洋色彩”和“马来亚色彩”的提倡，文学开始“本土化”。正如朱崇科所说的：华人多是生活在别的国家里，自有他们的土地、人民、风俗、习惯、文化和历史这些作家，当他们把各地区的生活经验及其他文学传统吸收进去时，本身自然会形成一种“本土的文学传统”(Native Literacy)¹ 因此，马华文学有两条根，既是来自原乡的“中国传统文化”及现处的国家的“本土文化”。

马华文学是马来西亚意识的产物，马华文学本土的声音强调的是，作品所描述的时空与大马土地与人民的生活，关怀的是马来西亚社会、文化、环境在过去及未来发展的认同与期待。马来西亚原是个森林之国，国家发展需要土地资源的开发，原始环境和动植物生态难免遭受横祸。环境伦理学要扎根于马来西亚本土，必然要渗透于文学之中，或借助于环境的刻画、借着优美语言艺术达、或悠远意境的渲染，来影响读者的价值心理。

有关马华文学，早期的作品在价值观及理念方面受中国影响；此外，西方文学思潮及文学的译介，也令马华文学受西方文化影响。随着时代的转变，马华文学逐渐被马来西亚的文化传统所改造。有关马华生态文学，90年代开始，马来西亚华文主要报章，几乎每一家都有刊载环保课题的专门版位，通常是每周一大版，还有专门负责撰写环保课题的记者；再加上各报文艺副刊上所登载的环保诗文，其数量也颇为可观，使环保文学赅赅然成为马华文学中较受关注的题材之一，也成为真正能够影响人们的现实生活的活性思想元素。

马华自然写作中，以沙拉越华文文学(砂华)的较多。² 处于世界第三大岛婆罗洲北部的砂拉越，其于地理环境、民俗文化、原住民、动植物生态等各方面都是有待开发的文学资源，给在地自然写作者提供了重要的写作场域。作家对自然的审美感悟，尤其因为其自然界在经济开发下严重受到破坏之际，他们对自然生态的观察而发觉被破坏，进而藉文字提出控诉、反思和呼吁。

田思是沙拉越人，因身居其处及对生态细心观察，他透过本身的经历与听闻而启动精神上的旅程，把心中的地理版图逐重新绘製出来。他生态诗歌中的地理具有“双重编码”，除了地景，也包含了人物的情感。生态使命感令他将生态环境的现状以及带来的后遗症写成诗歌，来审视和表现人与自然的关系，旨在唤醒人类灵魂对大自然的皈依，倡导人与自然的和谐共生。本文兹以田思作书写婆罗洲砂拉越生态的作品进行探索与诠释，探讨他对“本土”经验的深度拓展，以寻

¹ 详见朱崇科，《本土性的纠葛——边缘放逐、“南洋”虚构、本土迷思》，台北：唐山出版社，2004，页240-265。

² 马华文学“自然写作”的研究由钟怡雯首开先河，可参考她两篇重要的论文：钟怡雯，〈忧郁的浮雕——论当代马华散文的雨林书写〉，收入陈大为、钟怡雯编，《马华文学读本 II——赤道回声》，台北：万卷楼图书股份有限公司，2004年，页305-317；钟怡雯，〈论砂华自然写作的在地视野与美学建构〉，收入钟怡雯，《马华文学史与浪漫传统》，台北：万卷楼图书股份有限公司，2009年，203-246。此外，这方面的专书研究有：田思，《马华文学中的环保意识(1989-1999)》，吉隆坡：大将出版社，2006年。

踪异域、乡土呈现为结点，串联起沙拉越经验在不同本土空间中的叙事轨迹与精神延展，建构本土化生态文学图景。

田思曾以宏观视觉配合世界的生态活动关怀世界生态，比如写了一首诗〈地球日〉，配合1970年由美国人 Gaylord Nelson 所宣导，每年的4月22日是“地球日”，以唤醒世人爱惜地球为宗旨。诗中刻画一个患上帕金森症而被子女遗弃在宇宙老人院的老人，是田思用拟人化手法刻画的地球。1998年4月16日，国际动物福利基金组织公开一卷加拿大量虐杀海豹的录影带。过去，出生不到两星期的小海豹被大量猎杀，以剥取白色毛皮，使海豹一度濒临绝种。田思怀着为海豹请命的心态和对人性贪婪的憎恶，写了〈地球是一只大海豹〉。他由海豹的毛皮联想到覆盖大地的植被，于是以形象的诗行来刻画沾满血跡的罪行：“地球就是一只大海豹/它被剥去一层绿色外衣”。

以上诗歌显示田思把视野拓展到整个世界的生物之生存前途和归宿的思考。然而，田思的生态诗歌多数是关怀马来西亚土地，正如文化地理学家段义孚认为，地方由于“被赋意义”而成为“可感价值的中心”³和人类认同的对象。他用“恋地情结”(topophilia)来概括“人与物质环境之间的一切情感联系”，地方可因此成为“充满情感的事件的承载体，或者被感知为‘一个符号’”。⁴个人和群体对环境以及人与环境关系的普遍认识，是以对特定地方的认识为基础的。生态批评家推崇关于地方的文学，因为这种文学能够深刻而微妙地挖掘本土地方的特性，认识对自己的这个地方深切的归属感、认同感和责任感，提醒自己要“带着没有算计的心灵、带着父怀的态度去接近它”⁵。毕竟在沙拉越土生土长的经验使田思对环境先有了识觉，来自直接体会，自我与地理位置关系的思考，并产生对待环境的意念，以文字来标记地方环境。外来者通常只是间接的概念性观察。做为“内在者”的介入式书写模式，田思与“外在者”的对空间景观的想象有异，毕竟他可以更详细地描写环境生物之特点及转变。

由于瞭解大马自然与本土的历史，深刻领略生态沉郁问题，田思写出雨林的伤痛：〈林族悲歌〉⁶和〈红树林哀歌〉⁷。在经济发展下，沙拉越大肆开发森林，森林大量被砍伐。他到过实地后，整理相关环境资讯，毕竟空间是田思对地方的感觉经验。其描述方式，不仅联繫了事件与地方、知觉与形式，而且连结了精神结构与非空间的概念及价值。田思将其融入主体感受与文学性笔法中，借着诗歌抒发作为一个生灵对于森林的失去所蕴藏在内心中的诚实感受，对绿色森林被“屠杀”而胆颤心急，不断地感叹，代表了留住雨林的刻不容缓。

诗歌也描写了滥砍滥伐林木令红树林萎缩而带来的生态失衡，影响很多生物：“鱼族贝类从此绝灭/昆虫飞走了/水鸟消失了/而那热带雨林的生命秘密/永远成

³ Tuan Yifu, *Space and Place: The Perspective of Experience*. Minneapolis: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 1977, p. 4.

⁴ Tuan Yifu, *Topophilia: A Study of Environmental Perceptions, Attitudes, and Values*. New York: Columbia UP, 1974, p. 93.

⁵ Lopez, Barry. *Arctic Dreams, Imagination and Desire in a Northern landscape*. London: Pan, 1987, p. 228.

⁶ 田思, 〈林族悲歌〉, 《含泪为大地抚伤》, 吉隆坡: 千秋事业社, 1999, 页104-105.

⁷ 田思, 〈红树林哀歌〉, 《含泪为大地抚伤》, 页101-102.

为一个解不开的谜”。⁸ 诗人在对现代文明的祛魅中导致地球生态濒临失衡，发展生态环境问题急剧地改变着本土及威胁着物种。

此外，阅读了有关砂拉越的海龟局的报导，田思获知海洋环境的污染造成砂州的海龟生殖率已明显下降，乘着内心对海龟深沉的同情，写下〈海龟的泪〉：

大海将迎我
以万顷抚慰的柔波
还是窒息的油污与垃圾
我知道海水是咸的
因为渗着龟族母亲的泪⁹

〈椰虫〉¹⁰则是诗人描写国家的发展令古晋的海口出现严重的生态失衡现象；有一种原本寄生在沼泽地带的亚答芭的甲壳虫，却因为沼泽地带被发展商填平而失去栖所。为了生存，大量体积微小甲壳虫转向椰树摄取养料，令椰林纷纷枯萎，影响椰农的生计。田思在诗歌中以写椰树被侵犯：“啮破盔甲似的椰干/咬掉河岸一片风景”，以拟人化手法写椰树的形象，以及以比喻手法写椰农的困境：

发黄 干瘪 枯萎
沙滩上的舞者都秃了头
椰农的脸如脱皮的椰壳
行情像发酸的椰汁大泻肚子

虽然是椰子虫侵犯椰树，然而，作者对动物生存现状进行了生态反思，字里行间渗透着生态意识，为椰子虫洗脱罪名、力图还原昆虫的生命价值。作者力图仅将批判的矛头直指现代工业文明和人类中心主义，揭露破坏大自然的是人类，人类间接地侵入动物生活领地，导致动物植物被破坏：“潜伏的微型杀手/躲在沼泽亚答芭里窃笑”。很少人会重视虫的生存权利，但田思则流露出对于人类之外的其他大自然生灵的敬畏之情。客观上，作者印证了自然生态的尊严和力量，毕竟它们在自然生态与现代文明的对立中自然生灵的艰难的生存处境。

除了写动物，田思也马来西亚特有的热带食虫植物“猪笼草”（*Nepenthes benstonei*）；那是生长于海拔 150 米至 1350 米的地区，也是多种能够捕食昆虫的多年生草本植物。诗人以拟人化手法描写猪笼草：“我是涵摄天地精华/吐纳旷野灵气的/一口晶莹剔透的翡翠瓶”。¹¹虽然被列为“受保护的植物”，然而田思这些植物被因森林被开发而遭受横祸：

他们任意采摘的黑手
和咆哮而来的铲泥机
已使我和族群

⁸ 田思，〈红树林哀歌〉，《含泪为大地抚伤》，页 101-102。

⁹ 田思，〈海龟的泪〉，《含泪为大地抚伤》，页 88-89。

¹⁰ 田思，〈虫的世界〉，《含泪为大地抚伤》，页 79-80。

¹¹ 田思，〈猪笼草〉，《雨林诗雨》，吉隆坡：大将出版社，2012，页 155-156。

找不到容身之地

猪笼草拥有独特的吸取营养的器官——捕虫笼，捕虫笼呈圆筒形，下半部稍膨大，因为形状像笼。田思刻画在濒临绝种之前，猪笼草期待掀开圆筒形的笼子的瓶口，让人类“瞥见瓶中倒映的蓝天/那一片即将失去的蓝天/然后把蕴蓄其中的清水倒出/汇成最后一道清彻的溪流”。诗句显示出期待看到爱护植物的人类，而不是摧残。

诗歌充分显示了猪笼草的稀有性，在该地区应优先保护。作者在面对日益恶化的环境问题，提出要树立生态道德，改善人与自然的关系，因此通过其笔下濒危的植物生存状况表达了他的生态理想诉求。“失去的蓝天”隐喻人与植物共同生活在同一块土地上，起先，活在各自的世界里，应该和谐地享受着同一片蓝天。然而，随着科学技术的不断发展以及商业利益以及消遣心态的驱使，人类开始入侵植物的领地，受保护的植物也濒临灭绝。

以上数首诗歌显示田思选择接近动物的生存境地、了解动物的习性或遭遇的困境，以及植物的生存问题，再将想像与观察所得的对话，化为兼具生态关怀与文学价值的动植物书写，也因此颇能生动地拟想动植物的生存哲学。显然，田思反思文明对人的异化，文明所创造的这一切，事实上使人的心智矮化，心智矮化的人追求着，满足于脆弱到危如累卵的现代化生活，成了绿色文明的毁灭者。

2009年6月，田思在从沙拉越的加帛返诗巫途中，在马来西亚最长的河流拉让江上的快艇中，看到沿江的市镇自然景物之变化而写了〈消失的梦谷〉¹²：

我又重访梦中的江城
在快艇的冲浪节奏中
感受拉让江慈母般的脉息
看舷窗外景物如画

却有成排的木桐把美梦撞醒
那似曾相识的红树林
裸露出江涛冲刷后的贫瘠
晃过蕉叶掩映的加拿逸

加拿逸是砂拉越诗巫省下辖的一个县，这个地方仿佛是田思心灵的圣地，诗人对其青山绿水的记忆并不遥远。田思通过描写描写沿海市镇自然景物的消失，对环境产生陌生感：

万绿丛中的点点小屋已不复见
更不见那蜿蜒的赭色山腰哪里去了
我梦中如幻如真的江城
那晨雾萦绕的梦谷

¹² 田思，〈消失的梦谷〉，《雨林诗雨》，页126-129。

.....

一道破烂的九曲桥
兜不出现代化的迷宫
梦谷的苍翠已被糟蹋
谷底成了垃圾的堆积处

在诗歌〈人的问题〉之二〈陌生〉¹³中，他道出那种陌生感，其实是人造成的：

从乡村走入城市
从大自然走进文明
告别了一切虫声和兽迹
人唯一感到陌生的
竟是一

作者所产生的一种陌生感，事实上是一种焦虑感，毕竟现代社会孕生的高科技化、工具理性、物化、欲望化等所谓“现代文明”是当代生态危机产生的催生器，令各种生态危机愈益严峻。田思对人类发展此地，却令自然美被入侵，把苍翠的景色变成垃圾围城的困境提出反思，从各角度表现了人类回归绿色生命之家的忧患和期盼。田思将市镇与人的生态关系描述得极为晦暗，现代性强调人的主体性，却在现代化发展进程中丧失殆尽。空间对于人类而言不仅是客体的存在，而是人类意识的居所，心智对空间原型会产生一种物质想像，进而对空间进行审美与认同。如普瑞德所言：“地方不仅仅是一个客体。它是某个主体的客体。它被每一个个体视为一个意义、意向或感觉价值的中心；一个动人的，有感情附著的焦点；一个令人感觉到充满意义的地方。”¹⁴作品充满他对自然回归的期待、对诗意栖息家园的找寻，对自然景物及环境深切关注，旨在唤醒人类灵魂对大自然的皈依，倡导人与自然的和谐共生。

2010年10月，东马拉让江发生史无前例的“浮木阵”；由于出现过度伐木活动，一阵阵大雨导致山洪暴发，令大量的木桐、木屑等漂流下来，导致浮木堵塞。长达30公里的“浮木阵”从巴路依河上游河面漂流，木桐、树根、树皮及废木估计重达30万吨，造成水路运输系统瘫痪，且严重破坏拉让江沿河的环境及生态。身为在地作家，田思熟悉自己居住的地方环境，看到不曾在拉让江流域发生过、危及自然环境生态的事件而写了〈投奔怒海〉¹⁵。毕竟，地方之爱是人类对物质环境的连带情感，对地方的“爱乡主义”（patriotism）透过与地方的亲密经验而茁壮，由此衍生出对地方的热爱。通过记忆与感性知识的建立，透过此诗歌展现认同形。

诗人把“泣血的母亲河”成为“举世瞩目的焦点”的情况展露，以拟人化手法将热带雨林描写成“最地道的原住民”，本来是沙拉越土地的天然屏障，

¹³ 田思，〈人的问题〉，《含泪为大地抚伤》，页55。

¹⁴ 艾兰·普瑞德（Allan Pred）著，许坤荣译，〈结构历程和地方—地方感和感觉结构的形成过程〉（Structuration and Place: On the Becoming of Sense of Place and Structure of Feeling），夏铸九，王志弘编译，《空间的文化形式与社会理论读本》，台北：明文出版社，1999年3月），页86。

¹⁵ 田思，〈投奔怒海〉，《雨林诗雨》，吉隆坡：大将出版社，2012，页159-161。

却因为被“张牙舞爪的电锯/削去它们擎天的华盖/断绝雨林生态的繁衍/剥夺它们排氧的生机/壮健者惨遭肢解贩卖”。而被砍伐及被弃置的木桐，仿佛是“老弱残废者”，却“囚禁在幽深的山谷/那变相的集中营/它们层层堆积/互相挤压/成了表皮脱尽的光棍/但只要一息尚存/仍惦记雨林中绿色的梦”。

土崩后，田思把木桐描写成“百万难民手携着手，一起冲向汹涌大海”；由于这是拉让江百年来首次 30 公里长的河面，顿变成了一条木桐河，还残留着困在水中的一些浮木，变成了水上航行安全的绊脚石，甚至有的船只还卡在浮木堆中，动弹不得。诗人写道：“这是廿一世纪最大的越狱/这是生命史上最大的逃亡/缠延三十哩的难民图”。

身为在地作家，田思沙拉越这块土地情感和人事物产生深刻的联结共鸣，因此较易形成在地动人的书写。归属於某个地方，对地方有深刻而完整的认同，如同人文地理学者所标举的：“人们发现自己、生活、产生经验、诠释、理解和找到意义的一连串场所 (locales)。”¹⁶。这些浮木及木料残渣严重阻塞了拉让江江面，环境严重受到破坏，造成河道瘫痪。对当地居民来说，依赖河流生活的人构成威胁，“殃及鱼族也窒息翻肚”显示它也危害及致死拉让江里的鱼类，也令垃圾污染了拉让江这“母亲河”。田思通过此诗反映了文明发展对于乡野自然的掠夺与戕害；蓬勃的经济建设与竭泽而渔式的工业化建设导致非法和过度伐木，在砂拉越不断侵吞山林，肆意污染河流、动植物，人为地砸断了人与自然之间平衡和谐的生态链条，陷入了经济发展的后遗症中。做为创作的素材，

结语

以上这些作品对田思“我乡”的书写，以风格各异的表现手法，较为全面地反映了水土流失、杂讯污染、烟霾灾害、森林被砍伐、红树林萎缩、河流海洋生物的生存威胁、昆虫肆虐等物种危机和环境问题。田思以生活的场景及人生经历，用文字经营对环境的观察，借着诗歌呼吁人们自觉维护自然生态和人类社会的合理互动及和谐发展，充当着人与自然的“绿色的情感纽带”，剖开了工业革命的毒瘤和人性的沉痾，对文化的省思与期待。描写“本土化”的生态文学作品，不是作者闭关自守，而是相对于他者的一种自我重塑，它以自我文化身份的确立为前提，以本土的现实生态状况、内在体验以及文化传统为本位，激活传统又引进异质，通过有效的催化和整理，塑造出具有新质的生态文学本体，具本土色彩的独特性。诗歌道出沙拉越森林的伤口正日益扩大、糜烂、呼吁人类唯用态度所带来的伤害，应该要重新审视人与自然相处的模式，弭平人类与自然之间的沟渠。在生物生命意义的基础上，进一步站在与天地万物平等的立场上，期待大家重视其他生物的生存权利，努力寻求人与生灵的共生之路。

¹⁶ Richard Peet 著，王志弘等译：《现代地理思想》，台北：国立编译馆，2005，页 76